

中華百年史

抗日烽火

主编

吴廷桢

徐世华

编写

丁孝智

孙继虎

丛书

编者的话

根据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向广大青年进行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国情教育、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我们编写了《中华百年史丛书》。

《丛书》共 6 册，即《改变历史进程的战争》、《西学东渐》、《辛亥风云》、《抗日烽火》、《光明与黑暗的决战》和《三千里硝烟》。

《丛书》通过对鸦片战争后百余年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活动的叙述，寓理于史，史论结合，力求史事可靠，观点正确，文字活泼生动，说理深入浅出，将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

《丛书》通过不同的历史侧面，揭露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近代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赞颂了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威武不屈和为国牺牲的英雄志士，讴歌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爱国传统在近代的继承与弘扬，展现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胜利发展的曲折艰辛历程，显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走从“人民共和国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百年历史的选择。

《丛书》的编写、出版是在甘肃教育出版社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下完成的；西北师大历史系及系主任水天长同志也大力支持丛书的编写工作，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丛书》的缺点，乃至讹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和专家学者予以指正。

编 者

1992年8月 兰州

目 录

一、“大陆政策”与“九·一八”事变	(1)
二、十九路军淞沪抗战	(8)
三、二十九军与长城抗战	(15)
四、绥远抗战	(20)
五、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26)
六、卢沟桥的炮声	(36)
七、蒋介石庐山谈话	(44)
八、八路军和新四军	(49)
九、忻口、太原会战	(56)
十、大捷平型关	(62)
十一、八百壮士守四行	(68)
十二、“兽类的集团”	(76)
十三、血战台儿庄	(84)
十四、毛泽东纵论持久战	(91)
十五、“我们都是神枪手”	(98)
十六、驰骋在大江南北	(107)
十七、汪精卫出走	(115)
十八、白求恩与史沫特莱	(123)
十九、“天当房子地当炕”	(132)

二十、冈村宁次与“三光”政策	(140)
二十一、华侨与祖国抗战	(146)
二十二、五千里战线大破袭	(152)
二十三、赤胆忠义张自忠	(158)
二十四、“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164)
二十五、中国健儿赴缅作战	(171)
二十六、团结、胜利的大会	(178)
二十七、三巨头与中国主权	(187)
二十八、“人们将遭天罚”	(193)
二十九、斯大林对日宣战	(199)
三十、鞭炮声与喜悦的眼泪	(204)
三十一、历史的呼唤	(210)

“大陆政策”与“九·一八”事变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内除藩政，外学西洋，使一个贫穷落后的封建岛国开始崛起，逐步成为东方的强国，并且迅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

1890年3月，日本首相山县有朋趁著野心勃勃地上书天皇，提出了被人们称之为“大陆政策”的侵略方案。在这一方案中，日本制定了征服亚洲、称霸世界的侵略计划，这一计划共分5步：

第一步：征服中国台湾；

第二步：征服朝鲜；

第三步：征服中国满蒙；

第四步：征服中国本部；

第五步：征服全世界。

日本帝国主义按照这样的侵略计划，积极从事侵略活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清朝军队，并使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做为战争的胜利者，日本不仅实现了侵吞中国台湾和朝鲜的野心，而且战争的巨额赔款，

又大大刺激了日本的侵华欲望。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又在我东北境内打败了老大的沙皇帝国，从俄国人的手中取得了中国辽东半岛和南满铁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日本则乘机攫取中国权益，并坐收渔利，从德国人手中夺得了我山东权益。紧接着，日本又以支持袁世凯当“皇帝”为诱饵，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阴谋虽未完全得逞，但它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却并未稍有收敛。

正当日本野心勃勃，积极准备推行“大陆政策”的同时，中国国内则正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之际。从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中国国内几乎一直被内战的硝烟所弥漫。从1920年的直皖战争到1928年奉系军阀退回关外，中国大地上军阀之间的纷争从未间断过。军阀之间的混战，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国防实力，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一有利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的混乱，加紧策划侵华阴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田中义一组阁后，于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亲自主持召开了有外相、陆相、海相等高级官员参加的所谓“东方会议”。具体制订了对华政策，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所谓“满蒙政策”。会议宣称：一定要将满洲从中国分离出去，然后

纳入日本的政治势力范围。

“东方会议”之后，首相兼外相的田中义一将会议精神加以整理，写成洋洋数万言的所谓《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亦即《田中奏折》）上呈天皇。《奏折》宣称：“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74000方里，人口2800万，较我日本帝国国土（除朝鲜及台湾外）大逾3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当世无匹其敌。”又说：“我对满蒙之权利如可真实到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而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先征服“满蒙”，再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狼子野心。

日本帝国主义按照“大陆政策”和“东方会议”的既定方针，加快了对我国东北侵略扩张的步伐。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妄图趁火打劫，乱中扶持东北的亲日政权，达到肢解东北的目的。结果由于张学良迅速出任东北军政长官，并“改旗易帜”，在东北全境取下北洋政府时代的

五色旗，换上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归附了南京国民政府，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

1929年7月，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提出《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案》，鼓吹“满蒙问题的解决，是日本的唯一出路。”

1931年4月，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主持制订了《形势判断》的文件，提出了具体侵占东北的计划：第一步树立亲日政权；第二步建立独立国；第三步变成日本领土。

5月，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万宝山事件”，挑拨中朝村民械斗，试图寻找出兵东北的借口。

6月，又利用其间谋中村大尉被杀事件，借机煽动日本国内民族沙文主义狂潮。

8月，关东军频繁调动，不断举行以占领中国东北为目标的军事演习。

9月，日本的侵华准备活动更加频繁和疯狂。日本陆军军用飞机到处散发传单，鼓吹所谓“醒来吧，国防！”同月10日，日本法西斯各团体在东京青山会馆集会，狂噪立即对中国东北发动和行使武力；13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赴长春“视察”；14日，长春日军越出铁路附属地演习；15日，沈阳日本29联队、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联合举行攻打沈阳城的夜间演习；16日，日军步兵第29联队再次举行装甲车、汽车、山炮队联合演习。……日本军内外的法西斯分子，八方点火，四处串联，掀起了空前的战争狂热。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紧锣密鼓的战争叫嚣声中，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沈阳日军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密谋，计划于9月中旬爆破南满铁路，制造事端，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一场旨在吞并中国东北的罪恶阴谋即将出台了。

1931年9月18日，夜，死一样地沉寂，遥远的天际挂着半边残月，它在静静地注视着人世间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一切。大约10时20分，伴随着一声震天巨响，沈阳北郊柳条湖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飞向天空，巨大的震撼声和冲天的火光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日本帝国主义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爆炸声余音未尽，事变的直接制造者——日本关东军则贼喊捉贼，摆下几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妄图掩人耳目，并诬称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本侵略者的这种荒唐行为，连奉天省的日本邮政局长岐部与平也认为愚蠢透顶，叫人一看就明白现场是伪造的。

侵略者却完全丧心病狂，根本不理睬人们的议论，反而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命令关东军全线出击，迅速向中国东北军驻地的北大营、沈阳、长春、营口、锦州等地发起了猛烈进攻。

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屠刀已砍向了中国人的脖子，但中国国民党的最高统帅却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把解决事变的希望寄托在“国联”身

上，幻想通过“国联”的调停阻止日军的侵略。早在事变发生前，张学良就曾致电蒋介石，请求对日方略，蒋的命令是：“绝对不抵抗”。甚至说：“即使被日军勒令缴械，或占领营房，也听其自便。”事变发生后，张学良一夜连电数十次，蒋介石虽也复电数十次，但只是四个字：“不准抵抗”。

正是在这种“不抵抗主义”下，张学良率领的10余万东北军，除少数官兵违抗蒋介石的严令，进行了自发的反抗外，未做任何抵抗便撤出了东北，撤出了这块曾养育过他们的白山黑水。东北军辗转撤退，到了连日本人的影子也见不着的西北“剿共”前线，而日军则仅以2万余众，几乎兵不血刃，于18日当夜占领北大营，19日连陷沈阳、长春、营口、安东诸地；11月占领黑龙江；1932年1月初占领锦州。短短3个多月时间，我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全部沦入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之手。日本侵略者用这种卑鄙野蛮的手段实现了其“大陆政策”的第三步目标，并开始了对东北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震惊了全中国人民，他们纷纷组织起来，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斗争之中。在东北，抗日义勇军遍地而起，活跃在白山黑水之间。马占山的“江桥抗战”，苏炳文在海拉尔一带的抗日斗争；李杜、丁超、冯占海等在吉林的抗战等等，都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在察绥，冯玉祥、吉鸿昌等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举义旗于塞北，抗击敌寇，收复失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在南京，莘莘学子奋不顾身，走上街头，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掀起了。

十九路军淞沪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短短的3个多月里，相继占领了中国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为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同时也为了掩盖其强盗行径，转移国际舆论的谴责和中国人民的注意力，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它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日本帝国主义又把侵略矛头南移，在1932年1月28日公然进攻上海。中国驻军第19路军奋起还击，淞沪抗战爆发了。

早在“一·二八”事变前10天，即1932年1月18日，日本公使馆驻上海武官唆使5名日本僧人向正在上海三友实业社内操练的上海工人义勇军掷石头，引起双方冲突。接着数十名日本暴徒袭击三友实业社，纵火焚烧厂房和仓库。20日，日本方面又策划1000余名在沪日侨上街集会游行，抗议所谓中国人的“暴行”。在策划一系列阴谋之后，21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反诬中国方面蓄意制造事端，威及日侨人身安全，无理要求中国政府惩凶、道歉、

赔偿财产损失、立即取消抗日运动。并限上海市政府必须在28日晚6时之前作出“圆满”答复，否则日军将在上海采取自由行动。与此同时，日本驻中国长江流域的第一遣外舰队迅速向上海增兵，大有向上海开战之势。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和蓄意挑衅，国民政府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上海市长吴铁城于28日下午3时15分全面接受日本的全部无理要求。

然而，日本侵略者的最终目的是挑起战端，扩大侵略，所以并不以中国政府的全面答复而善罢甘休。就在上海市政府答复日方无理要求8小时15分钟后，即28日晚11时30分，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以保护居住在上海闸北一带的日侨安全为由，公然下令军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被迫还击，“一·二八”淞沪抗战由此爆发。

当时驻防上海的是国民党第19路军。该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下辖3个师，共3万余人。该军驻防上海之前，曾被蒋介石调往江西赣州围剿红军。在“剿共”前线，19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口号的影响下，曾集体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九·一八”事变后，19路军调防淞沪地区，担任淞沪守备任务。面对上海和全国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19路军全体将士深受感动，下决心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

人格。而对日军在上海的无理挑衅，19路军将士早已义愤填膺。因此，当日军挑起战火后，19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冲破南京政府不抵抗主义政策的束缚，公开起来抗战，从而写下了19路军淞沪抗战的光辉一页。

战争开始后，日本帝国主义幻想重温“九·一八”的好梦，以为中国军队不可能坚决抵抗，盐泽幸一狂妄地吹嘘：“四个小时即可了事”。日军以20多辆装甲车在前面开路，并配以重型火炮，兵分五路向驻防闸北的19路军发起进攻。第二天，日军出动飞机助战，对19路军的阵地滥施轰炸。面对自恃先进武器疯狂进攻的日军，19路军将士英勇杀敌，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经过一天激战，日军死伤惨重。鉴于兵力不足，为了等待援军再战，日军被迫于29日夜提出停战要求。19路军明知这是日军缓兵之计，但为了调整部署，抗击日军下一步的进攻，同意了日军这一要求。之后，19路军为加强上海兵力，除上海原有1个师的兵力外，又把驻防南京、镇江一带的60师，61师也调入上海，加强防御，严阵以待来犯之敌。

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后，立即撕下求和的假面具，于2月4日向19路军发起第一次总攻，并把战火扩大到江湾和吴淞一带。经过两天激战，向闸北进攻的日军被击退，吴淞安然无恙，进攻江

湾的日军一个联队（即1个团）也全部被歼，日军的这次总攻完全被粉碎了。日军司令盐泽幸一因此被免职调回本国，日军司令一职改由海军第3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接任。

野村到上海后，日军后续增援部队相继到达。这样，日军在上海的陆海空总兵力已达1万余人。日本侵略者满以为兵多即可取胜，新任司令官野村也狂妄地对西方记者夸下海口，说什么：“踏平华军濠沟之日，为时不远。”11日，日军在对闸北实施狂轰滥炸的同时，重点调兵遣将，兵分数路包抄吴淞炮台和吴淞镇。战况异常激烈，日军曾一度突破蕴藻浜、纪家桥等中国军队阵地。19路军与日军展开肉搏战，终于将日军赶了回去，夺回了阵地。经过一个星期的拉锯战，日军的第2次大规模总攻被粉碎了。2月中旬，日军又再次撤换指挥官，以新来增援的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代替野村的司令官职务。此时，日军在上海的总兵力已近3万人。19路军的抗战进入了更加艰苦的阶段。

植田上任后，自恃兵强马壮，装备精良，其侵略气焰更是不可一世。2月18日，竟向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说什么19路军必须无条件地在20日前从第一线撤退，撤除一切军事设施，否则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对于日军这一荒唐可笑的通牒，蔡廷锴、蒋光鼐嗤之以鼻，下令前线部队集中火力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通牒的回

答。日军见威胁不成，便于2月20日发起第3次总攻，重点攻击闸北到吴淞之间的江湾、庙行等地。日军首先集中密集的大炮施行轰击。然后以坦克、装甲车开路掩护，步兵随后，步步推进。植田也赤膊上阵，亲临督战。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19路军和前来增援的张治中第5军密切配合，并肩战斗。22日，植田孤注一掷，将其老本第9师团倾巢出动，向中国军队防守的庙行阵地发起最疯狂的进攻。一时间，数千发炮弹雨点般落在中国守军阵地，炸得山崩地裂，热浪腾天，日军乘机发起猛烈冲锋，敌我双方展开白刃战、肉搏战。霎那间，杀得天昏地暗，敌人终于惨败退去。经过数日前所未有的激战，到25日，植田的总攻计划也以失败而破产。

上海战事的失利，“堂堂皇军”在上海再三受挫，引起日本国内上下一片震惊。为挽回败局，日本召开内阁会议，决定继续向上海增兵2个师团，并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改派前陆相白川义则大将接替植田的职务。到这时，日军在上海的兵力已达6万余人，是19路军总兵力的2倍。日军处于绝对的优势，敌强我弱的形势更加严峻。2月29日，日军依仗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和精良的武器，向19路军发起了第4次大规模总攻。此时，上海战事已一月有余，长时间的战斗致使19路军伤亡巨大，武器弹药补给无望，且战线越拉越长。虽然19路军全体将士流血杀敌，拚